

推动旅游业转向品质竞争

王岩

日前,文旅部等3部门印发《关于整治强迫购物促进旅游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决定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工作,对旅游市场中存在的强迫购物问题开展全链条治理。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产业链长、经济社会效益高,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的重要载体、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促进旅游市场健康发展,营造安全放心舒适的消费环境,有利于推动消费市场繁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旅游市场监管力度,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文旅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出动人次,检查经营单位5万余家次,办结案件1600余个,有力打击了违法违规行。不少地方严查旅行社、旅游购物店的虚假营销行为,规范导游执业行为。

有的地方推广电子行程单、导游执业码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实现旅游团队行程可追溯、服务可评价。还有的地方指导景区不断优化预约管理、退换票制度,打造“30分钟响应、24小时办结”投诉处理机制,引导企业推出明码标价承诺,消费透明度持续提高。

然而,应注意到,暑期旅游高峰的到来仍暴露出诸多问题,影响游客们的消费信心。如强迫购物等顽疾仍然存在,个别商家利用“捆绑消费”侵害消费者权益,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导游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下一步,要加强对铁腕整治顽疾,净化旅游市场,让旅游消费更放心、更舒心,推动行业从价格竞争转向品质竞争,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强化多部门协同执法水平。健全旅游市场联合执法机制,聚焦热门线路、景区及购物集中区域,严查强迫购

物、价格欺诈等行为,对典型案件公开曝光。与时俱进修订完善旅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条款,明确强迫购物、不合理低价游的法律界定及处罚标准。推动旅游合同标准化、透明化,严禁“霸王条款”。将明码标价纳入景区评级指标,鼓励企业诚信经营。

提升智慧监管能力。提升全国文化和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服务功能,整合企业资质、团队行程、消费评价等数据,实现一网通管。推广“信用+旅游”模式,将旅游企业信用等级纳入银行信贷等考量,对守信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对失信企业实施行业禁入。全面落实《导游服务规范》,建立导游电子档案,实行星级评价制度,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

提升旅游行业服务与安全水平。推动各类景区服务提质升级,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游览线路,推行无理由退

票、错峰优惠等便民措施。引导旅游企业、导游等根据消费者评价反馈数据,不断开发旅游线路,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鼓励旅游行业协会制定服务规范,开展企业培训,打造中国旅游品牌。强化危险项目安全监管,要求旅游企业按规定购买责任险、配备应急设备,定期开展安全演练。

畅通投诉维权渠道。鼓励线上线下旅游企业健全投诉处理机制,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实现接诉即办。借鉴国内外旅游景区先进发展经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行先行赔付制度和赔偿机制,明确具体责任部门、先行赔付受理流程、各环节的完成时限。鼓励景区、平台等设立专项基金,对查实的侵权行为先行赔偿游客损失。建立跨区域纠纷调解机制,打破地方保护壁垒,保障游客异地维权权益。

赢在大学起跑线上：一种刻意营造的「新生焦虑」

王言虎

《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将所谓“高大街接班”推向舆论场。

这种“高大街接班”专门面向高中毕业,马上就要进入大学的准新生,囊括奥数、大学数学、大学英语、大学编程等多种课程,强调“赢在大学起跑线上”。还有的教育机构推出了针对大一新生的“保研陪跑”产品,暑假就对这些学生进行考研科目的辅导,以赢在保研起跑线上。

上大学之前还要上个街接班,这给人一种十足的冲击,甚至是一种扑面而来的窒息感:原以为高中毕业后就告别了应试教育的“苦海”,但谁能想到,刚从考场出来,又重新回到曾经的“战场”。而这不过是应试教育阶段的延续,沿袭仍旧是“做题家”的思维与套路。

“赢在大学起跑线上”,也让人想起人们耳熟能详的“赢在人生起跑线”,后者强调改变命运要从娃娃抓起,将儿童教育异化成一场比赛竞赛。“赢在大学起跑线”与之类似,毋宁说是它的延伸。其将大学生的竞争节点粗暴前置到大学入学之初,试图用短期的技能训练定义“领先”,让准大学生误以为,入学时多掌握几个知识点、多接触点“人脉”,就能一劳永逸地占据优势,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这也压根不符合大学的气质与培养目标。如果说高中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做题与应试,那高等教育的内容则要丰富得多:不仅是学习知识,也要训练价值,还要习得一份谋生技能。

无论如何,强调自由开放、探索人生多种可能的大学,与以“做题为王”的高中有着本质区别。“赢在大学起跑线上”继续将准大学生框定在高中生的学习轨迹中,这是一种完全悖逆教育规律与人才成长曲线的功利化做法。

而为了“收割”用户,一些培训机构疯狂进行新生焦虑营销,直接将“打破挂科率高魔咒”“提前锁定评优、奖学金及保研资格”写进营销话术,刻意营造一种紧张感,仿佛不衔接就要落后于人了。这种别有目的的误导,不断加深着家长与学生的焦虑。

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做题家”,格式化的训练永远催生出不出独立思维。大学教育的意义,在于让学生跳出题海,看到更多广阔的世界。“赢在大学起跑线上”与大学定位南辕北辙,只会扼杀大学新生本该蓬勃生长的可能性。

破解未成年人上网的新难题

金歆

近年来,针对各类未成年人上网乱象,相关部门不断加大治理力度,未成年人模式得到普及,针对未成年人的不良信息传播、游戏短视频沉迷等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然而近期,一些涉未成年人上网网的新乱象新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因粉丝“互喷”,中学生惨遭网络“开盒”,进而被网络欺凌;某短视频博主摆拍“姐弟互殴”剧情,借未成年人牟利……这些行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又往往容易逃避监管,甚至成为监管死角。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上网时间增加,进一步引发家长担忧。新型有害内容披上“伪装”,更易突破未成年人心智防线,传统治理手段面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挑战。对此,监管部门响应迅速。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清朗·2025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提出聚焦各类新情况新表现,做好问题整改。

新型乱象之所以较难治理,在于其善于隐匿,并与新兴技术紧密结合。不少不良信息不再明目张胆,而是以“擦边”等形式转换为“软色情”“软暴力”;有的则与未成年人喜爱的网络流行文化相结合,以卡牌、动漫等为载体,加以包装美化。另一方面,新媒体、新技术被不法分子利用。侵害者深谙未成年人的兴趣点,用短视频算法精准推送不良亚文化。某些社交应用的“悄悄话”“阅后即焚”等功能,被用来传播不良信息、实施网络骚扰,为监管追责设置了障碍。

为未成年人营造清朗网络环境,治理手段需要与问题一起“进化”,努力应对新情况,破解新难题。跳出“出了问题就整治,整治过后又出新问题”的“循环怪圈”,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的转变,从各主体各自为战到全社会协同共治的转变,如此,才能建立起长久有效的解决机制。

面对技术双刃剑的考验,我们需要更精细的防护网。要推动平台利用技术优势主动防御,提升对新型有害内容的识别拦截能力,优化未成年人模式功能,使其真正发挥作用。今年4月,在国家网信办的指导下,移动互联网青少年模式正式升级为未成年人模式,初步实现移动终端、应用程序、应用商店的三方联动,内容池引入权威机构资源并建立分层体系。相关经验有待不断总结优化,促进技术防护持续迭代升级。

根治乱象,需激活多元共治的生态系统。对于那些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则要加快制度供给,不断细化规则,尽量减少监管盲区,避免让一些违规主体有机可乘。家长要有效提升网络教育的意识和能力。相关部门也需畅通举报途径。唯有将技术创新、制度完善、社会共治有机结合,才能在数字浪潮中为未成年人筑起坚固的“成长防线”,让网络空间真正成为“精神绿洲”。



“绑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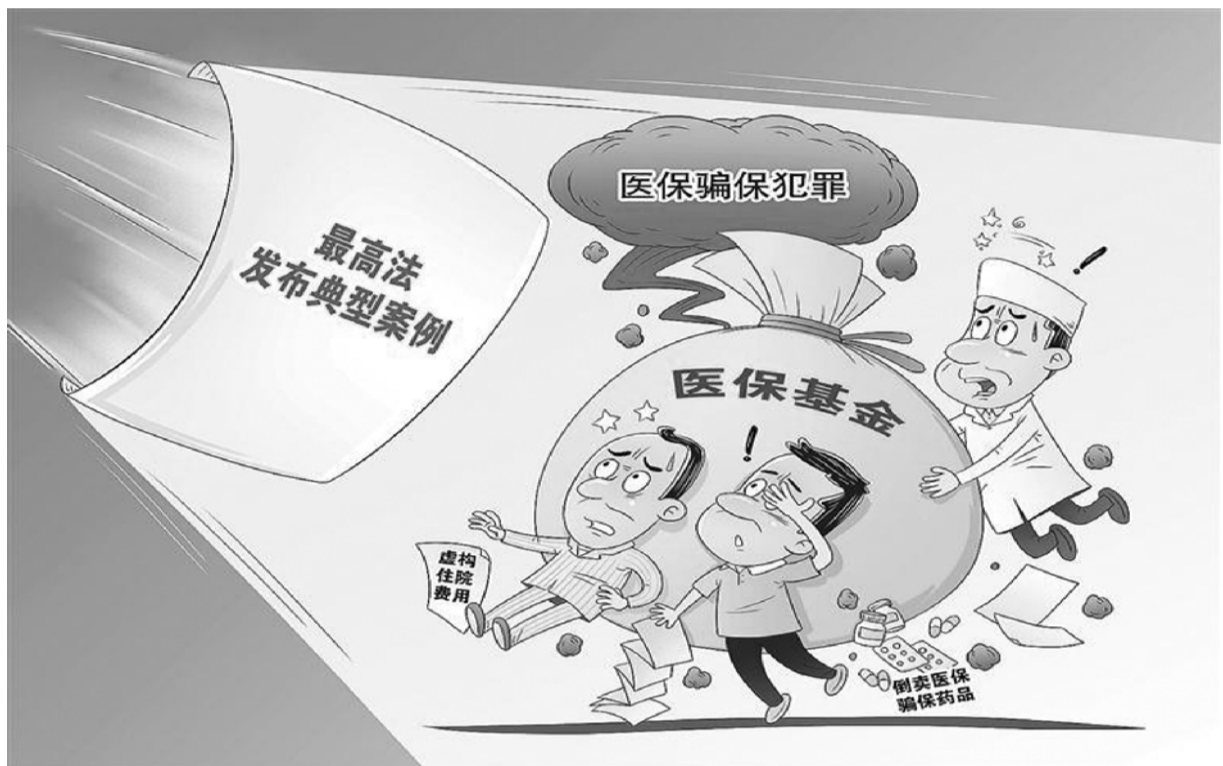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民王女士在帮外地亲友购买某景点门票时,发现小程序页面显示的价格与自己的认知存在较大出入,其他知名景点的小程序门票价格也有此类情形。原来,搜索“门票预订”等关键词后,排名靠前的购票小程序均是旅行社等企业账号,其通过缩小提示字号、捆绑搭售语音讲解等方式将门票价格翻倍。

“夹带私货”的各类企业账号无疑为游客的出游体验蒙上一层阴影,也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地方文旅形象。眼下是暑期文旅旺季,各地应紧盯线上购票乱象等新问题,对购票、游览、消费等全场景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和监督,这是游客的期待,也是旅游胜地应有的姿态。

赵春青/图 嘉湖/文

严惩医保骗保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多起人民法院依法严惩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充分展示人民法院依法打击治理医保骗保犯罪的决心和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医疗保障合法权益的责任担当。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近年来,随着医疗保障网络持续织密、基金规模快速增长,医保领域的骗保犯罪也呈现出手段迭代升级的态势,主要包括伪造医疗票据、医患合谋虚开诊疗项目、参保人倒卖药品等。骗保行为已从显性违规转向隐蔽数据造假,亟需强化智能监管与跨部门协同打击。接下来,应构建“智能监控+部门协同+社会共治”体系,推进大数据反欺诈模型应用,强化飞行检查与刑刑衔接。建立医务人员信用计分制度,并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形成常态化威慑,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医疗保障合法权益。(时锋)



新华社发 王琪作

假院士招摇撞骗,为啥没人戳破“皇帝的新衣”

刘辰

近日,一名声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阮少平”的男子引发质疑。据报道,在中国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院士名单、外籍院士名单、已故院士名单以及已故外籍院士名单中,均查无此人。8月5日,记者从相关方面获悉,“中国科学院院士阮少平”这一身份系伪造。

阮少平打着伪造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旗号,已在教育界游走多年,不少中小学“中招”。对此,一些网友疑惑,信息时代核查一名院士的身份并不难,相关学校和机构为何不对其身份进行核查?

事实上,假院士能在教育界游走多年,招摇撞骗而未戳破身份,表明当前部分学校依然存在“追名逐利”的浮躁校风、学风;学校想聘请院士这样高级别的专家做顾问,提升学校声誉,而不合法分子则看准这一点,投其所好包装身份。

对此,不仅要对付假院士打假,追究其招摇撞骗的责任,还要反思当前学校办学中存在的“唯帽子”情结。

对一所学校来说,聘请专家担任学校顾问,邀请专家在开学典礼上发

言,并非小事。如果不核实其身份,是极不严肃的。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学校还进行了公开报道,而上级主管部门也未对此提出质疑。

从现实情况看,似乎所有人都相信学校聘请的、邀请的就是院士,鲜有人去求证,似乎他披了一层“皇帝的新衣”。而从结果看,当地教育部门与学校均把这当成了工作的成绩。然而,这样的做法,会让相关报道反过来为假院士背书。于是,假院士凭这些“证据”混得风生水起。

2023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试行)》规定,禁止以院士名义参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学部及学术团体、学术期刊以外活动。按照规定,就是“真院士”,到中小学参加活动,也不能冠以院士名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院士头衔回归荣誉,并破除“唯帽子论”。

这也再次警示,办学要脚踏实地,不要搞花架子。学校聘请校外专家,不能追名逐利,做形式主义表面文章,而是要强调实际效果。就此去看,这起假院士事件,无疑需要涉事学校、当地教育部门深刻反思。

学历有高低职业无贵贱 择业之路可以更多元

陈俊宇

河南郑州一个烧饼摊,最近吸引了不少“流量”。一方面是因为摊上的烧饼造型各异,很受欢迎,更主要的是,摊主小杨的研究生学历引起了网友关注和讨论。

20多年前,“北大学子卖猪肉”的新闻,就曾引发对于就业观念、人才标准等话题的讨论。如今面对类似的现象,研究生卖烧饼依旧成为“新闻”,还是基于“研究生”与“贩夫走卒”二者间的反差。

应该看到,20多年间,社会的就业观念已经发生了不少可喜的变化,大众对于不同行业、各类就业群体持有包容的平常心。但是这样的“新闻”今天依旧为人所“乐道”,表明社会对所谓“学历”的认知还存在固化僵化之嫌,需要推动对学历价值、就业选择等形成更理性、更多元的认知。

摊主小杨的回应是,学历是人生的一部分,不应该是“枷锁”。这是一个值得点赞的认知。在一个更加多元的现代文明社会,只能做一种选择、只应走一条路径、只该过一种生活,这些是“既定轨道”,是无形的“枷锁”。小杨们走出了“既定轨道”,偏离

了社会“传统认知”,引发争议,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拥有更多体验和更丰沛的人生。

当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新兴职业层出不穷,在“既定”的职业路径之外,还有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比如在新近公布的一批新职业和新工种中,就涌现出诸如睡眠健康管理师、旅拍定制师、烧烤料理师等并不为大众熟知的工种。大量新职业的涌现,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各类群体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

实际上,摊主小杨做的并不仅仅是卖烧饼的生意。他做的烧饼手工雕刻,造型充满创意,受到大量网友的追捧。同时,他以烧饼摊为背景拍短视频,我们完全可以将小杨从事的烤烧饼、拍视频、做直播,理解为从事自媒体账号的新职业。这样引人入胜的职业表达,难道不算人尽其才吗?

学历有高低、职业无贵贱。社会中不同的职业和岗位,工作方式不同但本质相同。大家都是通过劳动获取所得、服务社会。只要对工作充满热爱,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取得出色的成就。

送外卖减肥,更应看到浪漫故事的另一面

果冻

“送外卖”这一原本被视为临时、边缘的工作形式,正逐渐被Z世代年轻人重新定义,赋予新的社会文化内涵。在杭州,有白领下班骑单车送外卖,三周瘦了5公斤。而据《南方周末》报道,一些公职人员下班后有了“第二身份”。从城管执法人员、银行经理到公务员,他们脱下“长衫”,骑上电动车,在城市街巷中寻找另一种生活体验。业内专家将“送外卖减肥”的现象解读为“数字时代零工经济与健康需求的结合”,反映出健康消费平民化、职业选择多元化、技术重塑生活方式的三大趋势。

为什么体制内外的年轻人同时奔向外卖?对Z世代的人而言,平台经济把碎片化时间变成了“可售商品”,既赚卡路里又赚零花钱。对体制内青年来说,“铁饭碗”也并不牢靠,他们需要在八小时之外找回即时回报与掌控感。十年前,公务员、银行经理的title自带光环,如今却被重新估值。当工作

变得流程化、回报延迟甚至被社会意义稀释时,送外卖这样即时反馈、任务清晰的零工劳动,就成为一个可见、可控、量化的“出口”,或者形成“自治生活”正向反馈——一份能掌握节奏、能真实感知成果的工作,也许比一纸头衔或单位名声来得更有意义。

送外卖之所以成为生活方式,在于它把减肥、社交、城市探索、情绪出口打包成一场游戏化任务。爬楼梯代替跑步机,深夜小巷取代办公室走廊,卡路里与人民币同时到账,这种即时满足填补了制度性职业的漫长反馈链:写材料要等季度考核,项目落地要跨财政年度,而骑手只需将倒计时就能听见“叮”的一声。与其说他们在消解困顿,不如说用兼职把庞杂的焦虑拆分成可完成的小目标。问题是,当多巴胺来自“下一单”,送外卖这种工作他们能做多久?一种可能是,如果主业无法缩短回报周期,增加可见成果,

副业就会变为主业。

更进一步地说,送外卖已然成为一部分中国青年应对城市生活压力的“中间地带”,既不是完全逃离主流职业轨道,也不是主动融入平台底层劳动大军,而是在不稳定中争取一点自我调节的空间。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精神韧性。在骑行的过程中,他们熟悉城市、锻炼身体、挣些外快,同时构建起一个微型、脱离单位的社交网络。

社群、数据分享、彼此监督乃至匿名认同,正是当下城市孤岛化背景下的一种软连接。然而,同一份兼职对体制内外的意义并不对称。公务员、银行经理体验生活时,社保、医保、公积金仍在原账户稳健生息。他们随时可以退回办公室,把电动车锁进地下室。真正靠跑单养家糊口的全职骑手却可能面临订单被分流、单价被稀释的风险。当“体验型骑手”批量涌入,平台算法

会不会青睐可灵活上线、无需缴纳五险一金的兼职者,从而变相抬高职业骑手的生存门槛?减肥送外卖的浪漫故事里,不能忽视被挤出的那一群靠外卖谋生的人。

据艾瑞咨询测算,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者已超2亿,其中外卖骑手约1300万,日均新增注册超3万人,平台型零工经济正以指数级速度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与城市空间。一方面是“新风尚”带动的健康热、社交热、城市漫游热,另一方面则是全职骑手老龄化、保障缺失的隐忧。要让这股潮流不沦为新的“内卷”,平台应被强制披露订单分配算法,建立“兼职池”与“职业池”的区隔。监管部门可以试点将职业骑手的工伤保险、职业培训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而享受了“体验红利”的白领骑手,也不妨把对城市空间的体察转化为公共提案,为这个就业群体说几句话,争一些权益。